

## 在古今东西之间

褚孝泉

从我住的房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围起来的断墙残垣。一台日本造的推土机正冲击着顽固地竖立着的几段柱基。这儿将要建造一幢崭新的商业中心，旧房子当然先要拆除干净。几乎在上海的每一个街区都可以看到一片片的旧屋在被夷为平地，为的是给明天腾出地方。深印在童年记忆中的那些木门小巷老树石凳一点点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些令人敬畏的玻璃和人造大理石的庞然大物。然而对旧上海的倾毁表示遗憾的多是些远道而来的外籍人士，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居民却大多欢迎这种变化。即使不少人为被迫迁往生活不便的远郊而抱怨，他们还是觉得市政府的主张无可反驳：只有毫不留情的清除过去，才能实现上海成为又一个纽约或巴黎的梦想。

在地域狭小而拥挤的上海，未来与过去的冲突是以争夺每一平方米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在整个中国，在迅速现代化的东亚以至整个第三世界，人们都在努力让未来冲破过去的束缚。有一个词表达了这些国家里人们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选择：发展。发展的概念里包含着一条时间上的轴向，隐含着一个未来的目标。在这个词的当代用法中明白地显示了偏向未来而背弃过去。

在汉语中“发展”是个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历史不足百年。这样一个为翻译一个西方概念而借自日语的词，本世纪初的中国人尚觉得它生硬，如今却是官方和民间话语中最常用的词。没有比这更深刻地显示了中国社会思想在这百年中经历的变化。况且

“发展”所指向的未来不是我们自己传统中的未来，上海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城市成为另一个纽约或巴黎，而不是一个新的长安或汴京。当代中国人的未来观是建立在一个双重的断裂之上的。

“仲尼祖述舜尧宪章文武”，儒家以复兴三代为己任。其实何止儒家，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儒、墨、道、法、农、兵百家诸说都接受上古存在着一个完美社会这样一个假说，可以说上古黄金时代是古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共同坐标，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不变的参照系。然而自从中国与欧洲文明开始那不幸的冲撞式的交往以来，自军事而器用，自制度而风俗，自思想而语言，中国传统节节败退，欧风美雨步步进逼。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上古黄金时代这个参照系消失了。人们不由得不转向时间轴上剩下的最后一段：未来。然而这未来该是怎样一个未来呢？基于盛衰轮转的传统信念而期待再一个西汉盛唐的重现？或许不得不再加上一点本土文化中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不管你叫它是体、是用、是科技、是意识形态，只能来自西方。即此，就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第二重变迁。西洋文明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新的参照系。二十世纪初常用“西洋新法”，最近几年里好讲“国际规范”，指的都是欧美模式。它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并且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任何类型的未来蓝图中的成分。这样就完成了刚逝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思想取向上的两重转折。由仰慕上古转为面向未来；从执着本土转为效法西洋。这个双重转折带来了知识类型和文化基础上的双重断裂。时间上的顺序性被打断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战争迫使我们不再盯着三代大同时代看；空间上的同一性被打破了，络绎而来的西人迫使我们向西方找根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失去了在文化时空中的自己的立足点。我们经历的这种双重断裂使得在当前中国文化话语中过去和未来具有双重的对立。过去不只是逝去的一段时间，而且是中国文化已逝或将逝的传统；未来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而且是西方已确立的模范。旧则中，新则西。过去即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未来则是民主自由电脑高楼。由此，在对明日中国的文化规划中也

就一直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草图。

有两位学者曾将上述两种文化改造规划相当典型地表述了出来。我们谈论这两位学者不是因为他们是最有名望的学界领袖，也不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拥有广大的追随者。事实上一般的评论者都将他们的观点视为偏颇极端而予以贬斥的。但是或许正是因为极端而更可看出他们所代表的两派主张的实质。我们要将之对比的一位是陈序经(1903—1967)，一位是辜鸿铭(1857—1928)。这两位学者的主张南辕而北辙，但是他们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共同点。两人都是出生于南洋华侨家庭，都是在欧美受的教育。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他们都是来自边缘的人物。这或许表明了中国文化是已经到了要由外来思潮来进行更新的时候了。

陈序经的名字是与“全盘西化”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主张明确而彻底，“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为何要这样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生存下去。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他列举了中国文化不及西方的方方面面。“中国每以食物之美夸耀于世界，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饥饿，而且这些所谓精美的食，未必合于卫生。”“中国人素持以自炫的丝布，至今也渐渐的比不上外人所制者之精美。”“至于住的简陋，更是没有可比的余地。……连了我们数百年的帝都城中的紫禁城、万牲园、颐和园里的宫室，比之外国一个很平常的人家住宅，除了广大以外，布置设备与清洁上还不如人。”“日常生活的娱乐，也是比不上西洋人。”“再从交通的设备上来看，中国的落后，尤为显明。”“国防固是如此，政治更不堪说，……我们放眼一看，见得盗贼的满眼，民生的涂炭，军阀的残酷，官僚的贪污。”“我们现时的法律，比之西洋法律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同样的。”“然而号称德治的国家的道德的状况也比不上人家。”“中国的哲学优胜过西洋吗？这无论是谁都不敢相信。要是哲学而像梁漱溟先生所说是思想的进一步，那么中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哲学的。”“至于文学也是落后得很，……怪不得现在一般为着文学用功的人，谈论也好，翻译也好，

“总免不得染着西洋的色彩。”“若说科学，愈要愧死。科学可以说是我们得未曾见过的东西。”“再说教育，中国之不及西洋，又是很明显的，人家有了百分之九十几是受过教育的，我们正是相反，有了百分之八十几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像上面所说的文化的各方面，既大大不如人，我们一切的农、工、矿、渔、盐、商等业也是样样不如人。”（陈序经《东西文化观》）

这样一张劣等生成绩单，在六七十年前是令人汗颜的，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则会使人坚决不认同的。陈序经的这个论点听上去像是令人讨厌的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显然是立论于在十九世纪的普世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来源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早已备受抨击而摇摇欲坠了。比较起来，来自另一个极端的的声音现在听起来要显得“政治上正确”得多。那就是前一阵很引人注目的辜鸿铭的言论。

著述于二十世纪初的辜鸿铭完全不理睬进化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估价。辜鸿铭说，“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从辜鸿铭的观点看，最要紧的是摆脱因物质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对未来的迷恋。我们应该做的是背过来面向过去，从永恒的中国传统中寻找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钥匙。这把钥匙便是“义”和“礼”。他说，“希伯莱文明曾授与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与‘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这种义礼并重的宗教，我称之为良民宗教。我相信，对于欧洲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那些不光要制止战争而且要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人来说，

良民宗教将是一种使其受益无穷的新宗教。”（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在辜鸿铭的笔下，我们不必从西方式的进化那里期待和谐美满的盛世，这个盛世早已到来，那就是按照孔子的教导组织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

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理论。但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对现实的批评。陈序经立论的出发点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恳切认识。而辜鸿铭立论的基础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劣性的揭示。陈序经出于对中国现实的不满而转向西方代表的未来。辜鸿铭深知西方文明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暴虐本性，所以转向中国的过去所代表的和平。陈序经呼吁的对象是面临亡国危机的中国民众。辜鸿铭演说的对象是深深失望的西方公众。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规划来自于两人完全不同的经验，指向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听众。经过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产生于上世纪初的这两种文化话语现在又具有了不同的相关性。随着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可能性的消退，陈序经理论中的那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紧迫性变得没有说服力了，而中国这几十年的西化过程又使中国渐渐的与欧美国家一起面临越来越相似的社会文化问题。这使辜鸿铭的这个一直被入定为顽固陈腐的理论现在听起来意外的切题。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陈序经仍然处于几乎完全被人漠视的境地，而辜鸿铭则重新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然而，为什么中西的差距在今天看来远没有陈序经那时所说的那么骇人？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今天中国的状况也差可与西方相埒，以至于陈序经的主张变得令人讨厌？实际上，中国这几十年来来的变化恰恰可做个有利于陈序经的论据。陈序经指出，全盘西化是中国民族生存的必经之路。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实际上自洋务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走这条路，中国已经和正在全盘西化。陈氏的西化论发表以来七十多年，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已不再显得那么羸弱不堪，那正是由于我们又西化了七十多年的缘故。我们现在以西式的卫生标准来检测我们的食品工业，西式的服饰流行于九

州内外,使中国的国防终有威慑力量的是西方发明的原子武器。教育的西化也远比人们想像的深。且不讲整个教育制度以及考试文凭方式全是移植自西方,教育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全是以数理化生物等来自西方的学科为主。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中国学生学习的课程与一百年前的同龄人学习的课程无论在科目上还是在内容上以至所用语言上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再看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医。中医学在中国继续存在,并受到政策的保护。但中西医的发展并不是平等并行的。医学专家们所做的是以西医学的思想方法来分析理解中医,而不是相反。医学研究项目中只有以科学手段分析某味中药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但从不见中医专家来确定某种抗生素是不是性凉味甘。中医学与中国传统的其他一切一样,已成为等待西方文化来分析来消化的材料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实际上已经西化得相当可以了。

确实,西化或许真是不可避免。我们的未来也肯定是与西方密切相关的。实际上陈序经的主张里最遭人非议的只是“全盘”两字。如果说迫使我们西化的是西方文化的功利效用,那么为什么不只吸收西方文化中能使国家民族富强的部分,而在其他地方仍保持传统文化呢?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薛福成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来,部分吸收西方文化的主张一直是个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陈序经与辜鸿铭,一持西化论,一持复古论,他们的言论非常彻底而纯粹。他们的主张在这一个世纪中却少有追随者,盛行于中国思想界的往往是这两种意见的某种混合物,或者是他们两人的立场之间的某个中间位置。是不是中国文化中偏好中庸调和的倾向使然?过去和未来,传统和革新,这是所有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中不可少的中心概念。围绕着这两对概念构筑起了所有各种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言论。这几个概念显得含义自明而易于理喻,因此自然而然地被用作了言论的起点。然而思想上的纯粹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的明确。思维中方便的抽象是不是一定就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呢?

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朝的工匠们曾在今天的江西南昌附近建造了一座滕王阁。这座楼阁曾以其雄伟高耸的气势而赢得了当时最有才华的文人的赞叹。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人们决定把倾圮已久的这座楼阁重建起来。但是重建起来的滕王阁远不是一座纯粹的古阁。当代的建筑师采用的是现代的建筑技术,运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材料。现代滕王阁的尺寸显然也与唐代的滕王阁不同。人们或可以批评建阁者着眼于旅游效用而不顾古迹原貌的做法,但这个事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不止于文物保护的意义。重建滕王阁是为了复古,但是在拥有了现代建筑技术之后,是不是还有可能仍然完全按照古老的唐代技术来搭建楼阁呢?换句话说,人类已获得的知识技术是不是能再被主动地遗弃忘怀呢?已学会了的就一定会被利用,已进入思想视野的就一定不会被漠视,而不管这知识是从何得到的和怎样得到的。这是知识之果对人类的命定的诱惑所决定的。再说建筑的结果。滕王阁在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中被描写为“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然而我们知道它当时的实际高度不会超过一二十米。如果我们重建它时也遵照它原来的结构高度,谁还会有宏伟壮观的感觉呢?这样,忠实于古代实际的尺度,就不忠实于古人实际的感觉;忠实于古人实际的感觉,就无法忠实于古代实际的尺度。换句话说,在回复传统的努力中,我们是无法忘却现代生活的经验的。当代生活经验所得注定要干预我们复兴旧物的行动。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复兴的诸位学者有的发现儒家传统中早有“民主”“自由”的萌芽,有的论证“民主”“自由”与儒家思想实不相违。论辩细密、用心良苦。原因就是作为一种当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即便以复兴古传统为宗旨,也无法忽视作为当代政治经验的主流“民主”和“自由”。

复古无法忽视现代。那么开创未来时是否就可以不及过去呢?中国当代史上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以扫除一切旧事物开创一个崭新未来为宗旨的社会政治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统治意识形态的是一种供奉“新”的宗教。这种对“新”的膜拜也曾迷惑过不少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然而如果我们观察

一下“新”的标签覆盖下的现实，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古老的政治行为的重演。“文化大革命”对一大批高级干部的清洗以及对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及文化创作的迫害曾引发了不少评论和分析。但是我们只要去读一下明清史便会知道这是与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取得政权后的行动非常类似的。只是行刑者以及定罪的用语不同而已。试图向未来的新世界跳跃，但是实际上还是羁绊于现实的政治关系之中。只要现实的政治关系与过去相同，在新的方式下能做的事只会是过去历史的又一次可悲的重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其发动者和领导者关心的也并非国家的富强。但是其名新而实旧的实质未必只是虚伪的结果。清除过去并不能阻挡过去执拗的回复。这恐怕也是“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一个教益。

在思考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时，我们不禁会想起普鲁斯特的那段著名的话，“*Homme occupe si peu de place dans l'espace, mais git comme un géant dans le temps*（人在空间中只占那么小的地方，可在时间中却能横跨古今）。他指出的是人类的一个几乎难以规避的生存条件。无论是全盘西化论、复古论，还是任何其他社会改造方案，对历史或未来的陈述都是其论题的起点，似乎人们在思考生活时已无法摆脱历史的度向。然而，实际上人们在空间上只占据一小点，在时间上面对的也只有现在的一点。过去和未来只是在现在生活经验上折射出来的幻影而已。这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过去和未来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想回复到过去的经验还是想创造出崭新的未来，都必须从现在出发。全盘西化论也好，复古论也好，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满于现在。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新旧之争一直震撼着中国。中国在这个世纪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复古或西化的社会改造规划恐怕比任何别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多。这是因为不管政见如何不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现实不满。过去和未来这两个幻像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话语中始终占了中心的地位。对于背负着三千年文明传统，又眼见西方的霸权优势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他们感到现在是处在一个空谷里。然而要走出这个空

谷并不是靠在过去和未来这两个幻像中作一个选择。真正重要的是要将现实从幻像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说不再对现实不满，那只会堕入到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卑劣宣传中去。而在这百年间对现实的不满和批评可说是导致中国进步的最有力动力。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做得更好的，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利用东西方文化的一切有益资源。未来的开拓一定要依赖于现实条件的组合，而现实条件的演化也必定是与过去的经验相关连的。断绝过去的激进主义和漠视世界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过去给中国带来的损害已经够多的了。我们期望中国以更理性的现实主义走向二十一世纪。曾对中国文化寄予莫大希望的伏尔泰告诫世人说，“应当耕耘我们的园地。”比起任何宏大的未来计划，比起任何动人的传统之旅，这个谦卑的劝告更适于中国的今天。如果中国人民在经过了漫长而多难的世纪之后学会了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许诺采取清醒而理智的态度，那么二十一世纪或许真的会带来一种新的前景。

